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Lina Xue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field.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they still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conclusion in some aspect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expound th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R&D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enterprise talent construction, corporate internal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industrial policy,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Keywords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薛莉娜

云南财经大学, 中国 ·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企业创新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领域的热点。论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分析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视角各有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仍未得出一致结论。为更好地了解企业创新的相关理论成果,论文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内外视角进行探讨,从企业人才建设、公司内部治理、资本结构等内部因素及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营商环境等方面外部因素阐述了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研发投入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其间所产生的机制作用。

关键词

企业创新;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仅再次强调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创新也逐渐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不仅对国家创新之路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决定性。论文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内外部角度出发,对近年来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体会国内外学者们对于企业创新的见解。

2 企业内部因素

本小节从个人层面和组织群体层面分别阐述企业创新活动的内部影响因素。

2.1 个人层面

2.1.1 高管特征

在企业管理决策中,高管扮演着重要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高管阶梯理论,高管特征包括高管共有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等)以及高管的个人特征(职业经历、专业背景、政府背景等),两者都对企业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从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已有研究表明随着高管年龄的增大,其倾向于制定保守的企业战略的可能性就越强,这是因为高管年龄越大,不论是其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更倾向于求稳状态,而不愿承担风险,而年轻高管偏好冒险,更具有创新意愿,因此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创新能力呈显著负相关(Soojin Yim, 2013)。现有文献对于CEO性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仍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女性高管与男性高管相比,对企业创新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减少了企业创新的广度和深度,阻碍了企业研发投入,而男性企业家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使得其更愿意提高研发投入(王清和周泽

【作者简介】薛莉娜(1997-),女,中国山西临汾人,在读硕士,从事公司治理研究。

将, 2015); 而也有研究表明, 当高管中男女比例处于一定均衡状态时, 可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提高企业的业绩, 且女性高管可以利用其人力资本和平等的性别文化促进企业创新 (Walayet、Joao, 2013)。

从高管的个人特征方面, 高管的职业经历和特定背景对企业创新有一定的影响。CEO 职业经历的丰富程度不仅有助于公司发展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 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渠道的创新信息, 在 CEO 职业经历丰富度和社会网络资源的共同作用下, 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提高 (Xiao Zhang 等, 2016); 而且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也能通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注度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效率 (Ou Dai、Xiaohui, 2009)。此外, 企业创新也受到高管的特定技术背景的影响, 拥有发明家经历的 CEO 通过运用其特有的能力促进管理层多元化发展, 从而有效减轻管理层短视行为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 (虞义华、赵奇锋、鞠晓生, 2018); 拥有专业技能资本的高管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压力, 进而能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发展。

2.1.2 企业人才建设与员工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因此, 企业内部有效资源的挖掘, 尤其是员工培养与人才建设, 也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2014年6月,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获得了上市公司的积极响应。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实施对象是非高管的员工, 通过让员工持有本企业的股票, 从而实现对员工“利益绑定”的目的 (Xin Chang 等, 2015)。分红权激励 (曹春方、张超, 2020) 和适当的股权激励 (Xuejiao Liu、Xiaohong Liu, 2017) 在有效刺激员工的积极性的同时, 也提高了员工风险承担的意愿以及公司的创新数量和质量,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发展。在长期阶段, 这种制度设计也促使员工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并积极发挥其监督管理职责, 但也存在员工因未获取股权激励而产生不公平感, 进而会抑制其对公司创新的成效。

为更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各地纷纷出台人才政策, 通过各种优惠和补贴吸引人才到当地生活工作。相关人才政策出台后, 政府承担更多的人才激励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降低企业负担的工资支出促使企业加大对研发技术人才的招聘。此外, 因人才政策, 更多的人才聚集于当地或企业将有利于营造创新要素集聚发展的氛围, 促使异质性知识的交流, 而异质性知识交流又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 (Vegt、Bunderson, 2005)。受到人才政策影响的公司, 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专利产出显著提升, 且人才政策“背书”能够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 便于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的市场资源, 进而从整体上促进企业创新 (刘春林、田玲,

2021)。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确产生促进作用, 在未来也应推行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

2.2 组织及群体层面

2.2.1 公司内部治理

公司的内部治理旨在降低由企业内部两权分离引发的代理冲突问题, 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薪酬契约是内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股权结构方面, 不同股东由于持股目的不同对企业创新的发展也存在异质性。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态度和投入。由于大股东同时承担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基于其风险规避心理, 大股东对于风险较大的投资规避性较强, 尤其对风险较大的创新投资更是如此, 也表明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中小企业, 其在创新投资方面存在明显的“惜金”现象 (张会荣、张玉明, 2014); 而若大股东是风险偏好者且关注公司长期的发展, 则在该公司代理成本降低后会增加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创新投资以及有效监督相关人员的创新行为 (杨建君、王婷、孙丰文, 2014)。

投资者同时投资两家以上的企业, 形成连锁股东, 这种连锁股东网络关系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广泛存在, 且深刻影响企业的行为, 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连锁股东不仅通过减少股权融资成本、增强企业间的信息联系和提高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方面促进企业创新 (Brooks 等, 2018), 而且通过委派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以及提高其创新意愿刺激公司的创新活动 (杨善重、李卓, 2022)。企业创新是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活动, 因此, 创新决策需要承担更高的失败容忍度和风险承担水平 (Luong 等, 2017)。根据投资组合理论, 连锁股东控制的企业越多, 其投资组合越分散, 其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若连锁股东投资组合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时, 其综合风险承担水平不仅提升且研发创新等风险活动也明显增加 (王红建、汤泰劼、刘梓微, 2018)。

薪酬契约方面, 在公司治理中, 薪酬管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 会使得管理者只顾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此时, 薪酬管理对于缓解这种偏离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合理的薪酬契约可以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基于效率视角下的锦标赛理论重点关注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效应, 将企业内部人员的晋升视为锦标赛形式, 不同层级之间的薪酬差距被作为管理者赢得锦标赛的一种竞赛奖励。锦标赛激励的衡量方法可通过 CEO 与非 CEO 高管之间的垂直薪酬差距进行度量 (Shen、Hao, 2018), 当薪酬差距水平较低时, 扩大薪酬差距将促进企业创新活动, 但在薪酬差距水平较高时, 扩大薪酬差距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孔东民、徐茗丽、孔高文, 2017), 且高管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资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高管薪酬机制是高管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种机制将管理层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联系, 不仅能增强管理者的

主观能动性和责任心而且也能调动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但当企业绩效下降时,高管薪酬机制的边际下降幅度显著低于其增长时的边际上升,这种现象称为“高管薪酬粘性”。有研究利用2007—2015年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且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中薪酬粘性对于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朱爱萍、韩翔、胡展硕,2021),所以企业应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措施应对高管薪酬粘性。

2.2.2 资本结构

企业创新需要有持续充足的现金流作为支撑,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积累很难满足,则必须利用资本杠杆促进创新活动发展。有学者表明,负债规模的上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消极影响:钟田丽等(2014)通过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当企业债务水平不断提高时将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也有学者发现,负债资金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通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后发现,企业通过负债进行融资时,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债务规模与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吴尧和沈坤荣(2020)以中国2007—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专利产出、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处于较低负债水平的企业增加负债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规模增长,企业负债水平超过一定规模时,增加负债将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2.2.3 企业文化

文化是一个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不可缺少的部分,良好的企业文化在企业人员之间起着凝聚、激励和导向作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源泉。潘健平等采用文本分析法研究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产出和效率的影响,发现在企业文化中合作的程度与企业创新活动呈显著正向相关性(潘健平、潘越、马奕涵,2019)。同时企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职场型旧文化存在劣根性,会阻碍企业创新;而创新型企业文化可以促进员工的创新活力,为企业创新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

3 企业外部因素

企业外部因素存在多方面,包括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外部大环境的发展趋势以及法律法规等。本小节将从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两方面梳理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因素。

3.1 产业政策及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在约束企业行为的同时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产业优化升级和技术变革转型过程中,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促使国内经济增幅提升。但是在微观企业,产业政策与公司的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却未能得到一

致的结论。一方面,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时,会伴随着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增加,使得企业为“寻扶持”而创新(Tian、Xu,2019),受产业政策激励的公司,虽然专利申请特别是非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却未关注其创新质量,且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已有研究表明其可能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绩效(陈文俊,彭有为和胡心怡,2020)。另一方面,创新活动是一个耗时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的复杂过程,且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Hsu等,2014)。但是企业创新的高风险性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能力,而产业政策通过财政补助、税收等行政手段缓解企业的创投资金压力,进而促进企业创新(余明桂、范蕊、钟慧洁,2016)。且相比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和低成长性企业,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的创新质量影响更大(张燕、邓峰、卓乘风,2022)。

为解决市场失灵、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政府采取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税收激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研发项目的实际回报率以及弥补了创新的市场,较低的税费负担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入,提高企业外源融资的可获得性,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增加。税收优惠政策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距(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2020)。对于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企业,税收激励显著促进其研发投入,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的数量显著增加,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质量,且企业创新活动的税费负担的降低也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Mukherjee、Singh、Zaldokas,2017);对于处在其他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则无明显的波动趋势(吴伟伟、张天一,2021)。

财政补贴对一般企业的创新影响未能得到一致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政府补贴能激励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Carboni,2011),弥补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Czarnitzki等,2011),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而另有学者表明政府补贴易使企业偏好追求创新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发展(Dandan Li,2020),从而削弱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挤出效应。

3.2 市场结构及环境

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也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最早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是熊彼特假说,其表明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之间是一种简单的正线性关系,随后Scherer和Mansfield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之后,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在有效的竞争市场环境中,当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较多时,更能激发该区域相关企业的创新活力以此促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Aarstad等,2016),且在寡头市场环境中,竞争性寡头市场的创新投入水平更高(Matsumura,2013),而垄断性寡头市场因其自身的利益优势(稳定的消费群体和高额利润)使得其在

产品研发创新方面固步自封,存在创新思维及能力的缺乏。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日益呈现高集中化趋势,促使市场结构逐步由竞争性垄断转向寡头垄断发展。这类市场结构的高度集中化会阻碍企业创新发展(唐要家、王钰、唐春晖,2022),且寡头垄断结构将破坏数字经济竞争环境并抑制企业的创新意愿。所以应强化反垄断政策在促进数字经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促进创新的潜力。

在市场经济中,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企业的行为受到市场环境的约束,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模式更为稳定,反之企业易遭受波动影响而减少研发投入。所以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促进企业R&D的投入,并进一步有力推动企业高质量的发展。市场环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其也在不同方面影响企业创新。首先,经济性壁垒通常能够帮助企业建立优势市场地位,享受更多的市场资源,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其次,行政垄断会使企业丧失创新活力(余东华、王青,2009),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垄断程度越高,企业的研发创新效率就越低。最后,非正规部门的灰色竞争抑制了正规企业的创新发展,且在管制负担重的地区更加严重,在资源富足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域有所减弱(张峰、黄玖立、王睿,2016)。

4 文献述评及展望

4.1 述评

上述文献分别从高管特征、企业人才建设、公司内部治理、资本结构等内部因素及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营商环境等方面外部因素探讨了企业创新能力、研发投入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及机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近几年对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更加独特。但是,对于某些影响因素如高管特质、产业政策等仍然存在争论,且研究领域也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研究中企业的研发投入的衡量标准有待商榷,当前研究主要使用企业披露的创新投资水平作为标准,但其真实性无法准确保证;其次,企业创新的确会推动经济和企业绩效的提高,但企业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未明晰;最后,研究企业创新时较多文献关注点在企业研发投入或专利发明的数量,鲜有对创新产出质量的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于企业是否进行创新活动的衡量标准应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努力取得较为确切统一的指标;不仅关注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进行创新的影响,也应特别关注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如何作用于宏观环境的成长。

4.2 展望

虽然国际上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笔者认为关于创新的研究领域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在

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环境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理论架构,并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探究。

参考文献

- [1] Soojin Yim. The acquisitiveness of youth: CEO age and acquisition behavior[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108(1):250-273.
- [2] 王清,周泽将.女性高管与R&D投入: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3):178-179.
- [3] Khan W A, Vieito J P. Ceo gender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 2013,67(may-jun.):55-66.
- [4] Zhang X, Ma X, Wang Y, et al. What driv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MEs? The joint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haracteristics, network ties, and firm ownership[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25(2):522-534.
- [5] Ou Dai, Xiaohui Liu. Returnee entrepreneu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9,18(4):373-386.
- [6] 虞义华,赵奇锋,鞠晓生.发明家高管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8(3):136-154.
- [7] Chang X, Fu K, Low A, et al. Non-Executive Employee Stock Option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1).
- [8] 曹春方,张超.产权权利束分割与国企创新——基于中央企业分红权激励改革的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9):155-168.
- [9] Xuejiao Liu, Xiaohong Liu. CEO equity incentives and the remediation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17,44(9-10):1338-1369.
- [10] Vegt G S V D, Bunderson J S.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Team Identific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48(3):532-547.
- [11] 刘春林,田玲.人才政策“背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1(3):156-173.
- [12] 张会荣,张玉明.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中小企业成长[J].*山东社会科学*,2014(2):114-119.
- [13] 杨建君,王婷,孙丰文.大股东控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14,34(4):204-210.
- [14] Chris Brooks, Zhong Chen, Yeqin Zeng. Institutional cross-ownership and corporate strategy: The cas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8,48:187-216.
- [15] 杜善重,李卓.连锁股东治理与企业创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43(5):117-141.
- [16] Luong H, Moshirian F, Nguyen L, et al. How Do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nhance Firm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7,52(4):1449-1490.
- [17] 王红建,汤泰劼,刘梓微.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与企业风险分担:

- 转嫁还是共担[J].财贸经济,2018,39(8):66-80.
- [18] 陈仕华,卢昌崇.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国有企业向私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7(5):107-118+169+188.
- [19] 李文贵,余明桂.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J].管理世界,2015(4):112-125.
- [20] 赵鑫,杨棉之,曹迅.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5):94-104.
- [21] Carl Hsin-han Shen, Hao Zhang.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Firm Innovation[J]. Review of Finance, 2018,22(4):1515-1548.
- [22] 孔东民,徐茗丽,孔高文.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J].经济研究,2017,52(10):144-157.
- [23] 朱爱萍,韩翔,胡展硕.高管薪酬粘性、企业生命周期与创新投资——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之友,2021(9):84-90.
- [24] 钟田丽,马娜,胡彦斌.企业创新投入要素与融资结构选择——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会计研究,2014(4):66-73+96.
- [25] 吴尧,沈坤荣.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20(3):57-71.
- [26] 潘健平,潘越,马奕涵.以“合”为贵?合作文化与企业创新[J].金融研究,2019(1):148-167.
- [27] Xuan T, Jiajie X. Do Place-Based Policies Promote Lo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J]. Review of Finance, 2021(3):3.
- [28] 陈文俊,彭有为,胡心怡.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否提升了创新绩效[J].科研管理,2020,41(1):22-34.
- [29] Po-Hsuan Hsu, Xuan Tian, Yan Xu.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4,112(1):116-135.
- [30] 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5-22.
- [31] 张燕,邓峰,卓乘风.产业政策对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效应[J].宏观质量研究,2022,10(3):63-78.
- [32] 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J].经济研究,2020,55(6):105-121.
- [33] Mukherjee A, Singh M, Zaldokas A. Do Corporate Taxes Hinder Innovation?[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5.
- [34] 吴伟伟,张天一.非研发补贴与研发补贴对新创企业创新产出的非对称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3):137-160+210.
- [35] Li D.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of Enterprises[J]. Francis Academic Press, 2020(7).
- [36] Oliviero A. Carbon i. R&D subsidies and private R&D expenditures : 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dat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1,25(4):419-439.
- [37] Czarnitzki D, Hand P, Rosa J M.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R&D Tax Credits on Innovation: A Microeconomic Study on Canadian Firms[J]. Research Policy, 2011,40(2):217-229.
- [38] Matsumura T, Matsushima N, Cato S. Competitiveness and R&D competition revisited[J]. Economic Modelling, 2013,31(1):541-547.
- [39] Aarstad J, Kvitastein O A, Jakobsen S E. Related and unrelated variety as regional drivers of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A multilevel study[J]. Research Policy, 2016,45(4):844-856.
- [40] 唐要家,王钰,唐春晖.数字经济、市场结构与创新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22(10):62-80.
- [41] 马骆茹,朱博恩.需求波动、营商环境与企业的研发行为——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2):47-57.
- [42] 余东华,王青.行政性垄断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J].软科学,2009,23(8):74-81.
- [43] 张峰,黄玖立,王睿.政府管制、非正规部门与企业创新:来自制造业的实证依据[J].管理世界,2016(2):95-111+169.